

“王明殿,你这个骗子!没有钱你还上什么电视,还吹自己是什么慈善家?!”一位来自辽宁大连的妇女,在向山东青岛慈善人士王明殿索捐无望之后,守在王明殿的小饭馆前声嘶力竭地哭喊着。

这是王明殿最近遭遇的索捐事件中的一个。记者了解到,类似的索捐事件在各地均有发生,索捐正在成为一种发人深省的现象。

「索捐」



“好心没好报”的困惑

王明殿等慈善人士有一个共识,即亲自上门索捐的人,大部分是家里确实困难,但形形色色的索捐行为已经使他们的生活受到了严重影响。“没想到,好心助人却引来这么多的麻烦。这样下去,将来谁还敢搞捐助?”王明殿对记者说,“对于慈善行为,以前自己感到很光荣、很欣慰,然而,现在感到迷茫、困惑甚至有些后悔和恐惧。”

就因为这些困惑,许多慈善人士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不愿在记者的报道中透露他们的姓名,以免惹来不必要的麻烦。济南和青岛的两位慈善人士说,不管是社会有意宣传、褒奖,还是慈善人士自己有意无意地透露,慈善人士的事迹总会被社会所了解。从另一个角度讲,个人力量毕竟有限,如果所有慈善人士都默默捐助,那肯定不能带动社会公众关注、投身慈善事业,也不能激励慈善人士持之以恒助人,不利于慈善事业的发展。“慈善人士往往一浮出水面,麻烦就来了。”王明殿说。

专家:慈善热情需要法规保护

王明殿对记者说,“对于慈善行为,以前我感到很光荣、很欣慰,然而,现在感到迷茫、困惑甚至有些后悔和恐惧。”

记者采访的一些慈善人士说,近年来耳闻目睹的“索捐”现象让他们寒心,捐助积极性已经受到影响。

山东省社科院研究员鲁仁说,慈善行为是人的一种精神追求,是慈善人士一种自觉自愿的行为,而不是一种义务。然而,许多身处困境中的人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往往对慈善人士抱着过大的期望;当最后的希望破灭之后,他们往往就把慈善人士和骗子等形象联系起来,出现不理智的言语和行为。

鲁仁说:“个人——个人”的捐赠方式其实是一种落后的方式,它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索捐”现象的出现,还容易导致慈善资源浪费。完善的“机构——个人”的慈善运行方式,才是我国慈善事业发展的方向。” (据新华社)

慈善人士不能承受之痛

捐款箱

捐助惹出来的“麻烦”

王明殿是青岛市崂山区东韩村村民,1993年至今,共为740名学生捐钱捐物,价值累计100余万元。他的事迹被媒体报道后,他也获得了“感动青岛十佳人物”、“中华慈善事业突出贡献奖”等40多个荣誉称号。

然而,随着自己的出名,王明殿的麻烦却越来越多,其中尤以各种各样的索捐让他非常烦恼。

前文提到的那位大连妇女的孩子患有白血病。从电视上看到了王明殿的事迹后,她来到了王明殿经营的小饭馆,求他捐8万元给孩子治病。王明殿说手头在没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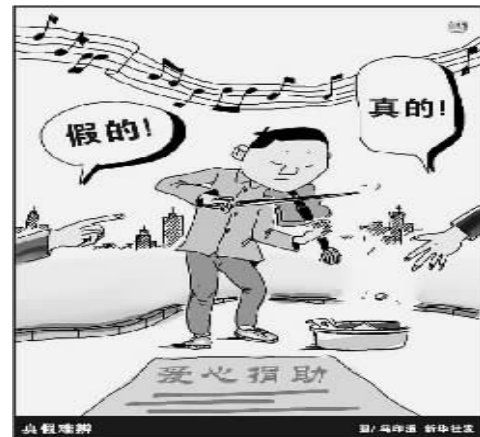
么多钱,只能给她1200元作为回家的路费,请她另想办法。这位妇女索捐不成绝望了,于是就出现了前文的一幕。

王明殿有一个小本子,一一记录了他遇到的索捐事件:2007年年初以来已有138人上门“索捐”,最多的一天达到了12名,最远的来自宁夏回族自治区。

王明殿的遭遇并不是个例。近日,包括王明殿在内的多位来自山东青岛、江苏南京、吉林长春等地的慈善人士,一起到北京参加一个慈善活动时,向记者介绍了亲身经历的五花八门的索捐事件:一个家庭贫困的农民上门求助没

拿到钱,就扯来一张席子,把自己裹在里面,横躺在慈善人士经营的饭店门前逼人捐钱;有的困难人员趁慈善人士家属住院到病床前吵闹,逼人捐款……

许多慈善人士还反映曾经受到实为敲诈勒索的“索捐”:有人向慈善人士讨要根本就不存在的10年前借去的5万元钱;有人叫上一帮大汉登门索捐,随后不时半夜打来电话让慈善人士意思意思。王明殿曾接到一个电话,对方称:有人雇我们花5万元买你的一条腿,但我们看你是一个善人,如果你拿3万元出来,我们对付过去就算了……



游街(1)

对于孙满仓的死,上级和大队干部定性为畏罪自杀,虽然胡荣花成了犯罪分子的家属,支书刘庆典他们倒是没有再难为她。

孙满仓走后,胡荣花心如死灰,万念俱灰,十几天躲在家里,除了给两个孩子做一点饭以外,自己不吃

不喝,以泪洗面,瘦得不像人形。过了十多天,胡荣花开始出门以后,脸色也好了一些,几个不知深浅的邻居兄弟,试探着给她开玩笑说:“嫂子,快去给满仓哥的坟头扇扇,你再锉一锉儿吧(改嫁给本家兄弟)。”胡荣花的脸一沉,扭头就走,到了没有人处,又放声哭起孙满仓那个死鬼来。她想到,自己的命咋这么苦,一个男人炮轰了,一个男人揪死了,连个男人都守不住。虽然说不清两个孩子到底是谁的种,她心里只认定就是孙满仓的。她的两个孩子又年幼,自己再苦再难也要把他们拉扯大。为了不让孩子们当“带棒儿”(又叫“拖油瓶儿”),受后爹的气,发誓至死不嫁。

有好长的一段日子,无论相好们怎么敲门,她不但不开,还咬牙切齿地骂他们,仿佛立志要给孙满仓守节。由于没有了外来的接济,胡荣花一家三口的日子越过越差。

大约过了半年左右,胡荣花再一次敞开了爱的胸怀。与以往不同的是,她不再是隔一个时期固定一个对象,而是来者不拒,兼收并蓄。

她的条件是相好的必须不能空手,凡是不带东西的人坐一会儿,说说闲话可以,要想上床是根本不可能的,许再大的愿也不可能让她把裤带解开。也有人“硬上弦”,强拉硬拽的,胡荣花如同愤怒的母狮子又抓又咬,又哭又骂,让他不能得逞。因此,二孬和丫丫的生活水平要比同龄的孩子们高一大截子,丫丫还把她妈挣来的糖块分给小伙伴们吃。有一次,贵亭叔的孙女刘小芬,拿着一块糖回家给贵亭婶吃。贵亭婶知道了这块糖的来历以后,勃然大怒,随即把这块糖扔在粪坑里,还动手打了自己最疼爱的小孙女。丫丫再一次给小芬糖时,小芬说啥也不要,并且说:“俺奶奶说了,你的糖脏,谁吃了谁的肚子里生虫子!”

常言道:“寡妇门前是非多。”几年来,寡妇胡荣花的门前门后发生了不少是非。终于,这些在寨子里经常传得沸沸扬扬的绯闻,演变成了闹剧和悲剧。

那是在“文革”开始后的一个时期,主要是对群众进行阶级教育,大队小学里的教师们到了夜

里,就被分配到各生产队读报,教唱歌,教背语录。“东方红”、“社会主义好”大人小孩都会唱得滚瓜烂熟。其中唱得最多的,是一首“不忘阶级苦”的歌,旋律比较优美,寨子里,地里到处飘荡着这首歌如泣如诉的旋律:

天上布满星,
月牙儿亮晶晶,
生产队里开大会,
诉苦把冤申……

唱“忆苦歌”的同时,大队里还组织召开了忆苦思甜大会。说是忆苦思甜,其实无甜可思,主要还是忆苦。大会之前,刘庆典专门让支委们挑了几个苦大仇深、能说会道的人在会上讲演。

刘八爷口才好,就被大队干部荣幸地选中了。会上,他上台绘声绘色地讲了过去受地主老财剥削和压迫的苦难,讲到伤心处哭得十分哽咽。在一片哀伤的气氛中,台下的男人们个个阴着脸儿,妇女们哭成一片。

当讲到他大伯被拉壮丁的惨痛经历时,刘八爷说:“……我伯一看,队伍上几个大兵来抓他,撒腿就跑,

后边几个国民党的龟孙子就撵,我伯跑呀跑,跑到了三队下粉条的院子里,后边的枪声炸豆一样地响了起来。我伯知道这里不能躲藏,又翻上了院外的半截墙,刚刚爬了上去,‘砰’一枪,打着我伯的后腿呀……”

男人群里不知谁小声问:“老八,老八,咋没有打着你伯的前腿呀?”一群人哄地笑了起来,气得刘庆典拿起一只鞋敲桌子,厉声责骂群众:“笑啥笑?你们到底有没有阶级立场?谁再笑给我揪上来!”一群人伸伸舌头,谁也不敢再笑了。

另一个忆苦对象是周老九,周老九是大队小剧团里唱丑角的,平时说话很惹人发笑,这一次却不搞笑。但他讲的苦处,让人越听越不是滋味,竟然诉苦诉到了1960年饿死人的事情,这可是新社会发生的惨剧。诉这种苦,与刘大爷当政时的政绩分不开,显然有点反动。正讲得带劲儿,刘庆典赶紧用别的话岔开,让他继续照这个话题说下去。